

顧隨全集

卷七

文录

著以漢大官書西報送之

年重。有寄株于岩桂，需石城少子植
持词，惠句征光，邀叔友到。草时甚，不往。
雪梅空况是已归矣。瑞西一腊，十载
经。寂寞计，根高山，蝶翥翥，繁花
飘舞。耗油一束，一束，白腊，一束，铺锦，一束
装树，送志，意，残香。

卜算子 痘少作

深山寒夜，去江村，偏仰人。一寄
情仍在江村裏。母慈父慈姑，保吾病
何如。不見源，塵，詮，老，但是六花記。
誰涼，上露，少半日。
忘情，少忘，寒似冰，市，寒，闇，咽，聲，絕。
柱鉢，朱門，桂，單，萬，寺，何，客，空，月，生，中。
四，多，年，客，已，無，行，更，入，是，流，表。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顧隨全集

卷七

传文录

目 录

《论语》六讲	(1)
一、“君子”与“士”	(3)
二、“低处着手”与“犯而不校”	(7)
三、“唯”与“拈花微笑”	(10)
四、“三省吾身”与“直下承当”	(14)
五、“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18)
六、“以友辅仁”与“为政以德”	(22)
附 《论语》断说	(28)
《中庸》说解	(31)
一、《中庸》发端	(33)
二、《中庸》结论	(43)
三、《中庸》言道	(53)
附 物(体)·道·法	(82)
《文赋》十一讲	(85)
一、创作之情趣	(90)
二、体裁与风格·之一	(93)
三、体裁与风格·之二	(96)
四、体裁与风格·之三	(99)
五、体裁与风格·之四	(103)
六、体裁与风格·之五	(108)

七、创作与文法·之一	(113)
八、创作与文法·之二	(118)
九、创作与文法·之三	(124)
十、创作总说	(128)
十一、创作与欣赏	(132)
 《文选》选讲	(137)
课前闲叙	(139)
开堂引言	(146)
一、繁钦(休伯)《与魏文帝笺》	(149)
二、陈琳(孔璋)《答东阿王笺》	(166)
三、李陵(少卿)《答苏武书》	(172)
四、杨恽(子幼)《报孙会宗书》	(181)
五、孔融(文举)《论盛孝章书》	(201)
六、朱浮(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	(205)
七、曹丕(子桓)《与朝歌令吴质书》	(208)
八、曹丕(子桓)《与吴质书》	(217)
九、曹植(子建)《与吴季重书》	(221)
十、嵇康(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	(225)
十一、丘迟(希范)《与陈伯之书》	(245)
十二、刘峻(孝标)《重答刘秣陵沼书》	(256)
十三、干宝(令升)《晋纪总论》	(263)
十四、范晔(蔚宗)《逸民传论》	(270)
十五、沈约(休文)《恩幸传论》	(281)
十六、李康(萧远)《运命论》	(292)
散文漫议	(300)
 文章短说	(305)
一、《史记》概说	(307)
二、说“赋”	(309)

三、说张岱文.....	(310)
四、翻译文学.....	(312)
五、文学创作之二现象.....	(313)

《论语》六讲



人，先须修成人的形，然后才能成为大写的人。人者是兽心，但有一定身格。至于“有”，不但有此心，还要表现出来。

一、“君子”与“士”

“君子”一词，含义因历代而不同。字是死的，而含义现装。讲书人有自己主观，未必为作者文心。

一切皆须借文为志达，好固然好，而也可怕——写出来的是死的。生人、杀人皆此一药，药是死的，用是活的。用得不当，人参、肉桂也杀人；用得当，大黄、芒硝也救人命——而二者药性尚不变。而文字则有时用得连本性都变了。

“君子”向内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在《论语》上如此。向内是个人品格修养，向外是事业之成功。此是人之长处，亦即其短处。

佛教“度人”，即儒家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而佛教传至中国成为禅宗，只求自己“明心见性”。再看道教，老子原来是很积极的，老子“无为”是无不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但什么都受它支配；“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能之先”（《道德经》七十八章）。可是现在所说黄老、老庄，只是清静无为，大失老子本意。

君子不仅是向内的，同时要有向外的事业之发展。向内太多是病，但尚不失为束身自好之君子，可结果自好变成“自了”，这已经不成，虽尚有其好处而没有向外的了——二减一，等于一。宋元明清诸儒学案便只有向内、没有向外。宋理学家愈多，对辽、金愈没办法，明亦然。

只有向内、没有向外，是可怕的。而现在，连向内的也没有了——一减一等于零了。《官场现形记》写官场黑暗，而尚有一二人想做清官。《阅微草堂笔记》记一清官死后对阎王说，我一文钱不要，“所至但饮一杯水”。阎王哂曰：

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平？（卷一《溧阳消夏录一》）

刻一木人，一口水不喝，比你还清。而那究竟还清。其实只要给老百姓办点儿事，贪点儿赃也不要紧；现在是只会贪赃，而不会办事——向内、向外都没有。这是造成亡国的原因。老子“无为”是无不为。

曾子在孔门年最幼，而天资又不甚高，“参也鲁”（《论语·先进》）。曾子虽“鲁”而非常专。“鲁”，故专攻，固守不失。然此尚为纸上之学、口耳之学，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禅家所谓稗贩、趸卖，学人最忌。曾子不然，不是口耳之学，固守不失；而是身体力行，别人当作一句话说，而他当作一件事情干。他是不但记住这句话，而且非要做出行来。他的行为便是老师的话的表现，把语言翻成动作。所以，颜渊死后只曾子得到孔子学问。

何以看出曾子固守不失、身体力行？有言可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此曾子自讲其对“士”的认识。“士”乃君子的同义异字。我们平常用字、说话、行事，没有清楚的认识，在文字上、名词上、事情上，都要加以重新认识。曾子对“士”有一个切实的认识，不游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模糊；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不浮浅；而且还不只是认识，是修、行。

（一）认识；（二）修；（三）行

“修”，如耕耘、浇灌、下种，是向内的。若想要做好人，必须心里先做成一好人心。如人上台演戏，旦角，男人装的，而有时真好。

如程砚秋一上台，真有点儿大家闺秀之风，心里先觉得是闺秀。狐狸成人，先须修成人的心，然后才能成为人的形。人若是兽心，他面一定兽相。至于“行”，不但有此心，还要表现出来。

读经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固然读书皆当如此，尤其经。先不用说不懂、不认识，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轻重，便不是了。《史记·孔子世家》引《论语》往往改字，而以司马迁天才，一改就糟，就不对了。《论语·述而》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史记》改为：

三人行，必得我师。

是还是，而没味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若改为：

士必弘毅，任重道远。

是还是，而没味了。

曾子所谓“弘毅”，“弘”，大；“毅”，有毅力，不懈怠。“任重而道远”，不弘毅行吗？曾子语气颇有点儿孔夫子味：

……不亦重乎？……不亦远乎？

讲牺牲，第一须破自私，人是要牺牲到破自私。而人最自私。想，容易；做，难。坐在菩提树下去想高深道理，易；在冬天将自己衣服脱给人，难。而这是仁，故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而若只此一回，还可偶尔办到，如“慷慨捐生易”；而“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至死方休，故须弘毅。曾子对士之认识、修、行算到家了，

身体力行。

任 ←— 重 —— 弘
道 ←— 远 —— 毅

合此二者为仁，道远亦以行仁。

仁（道），君子（人），以道论为仁，以人论为君子。

朱注：“仁者，人心之全德。”这太玄妙，无从下手，从何了解？从何实行？朱子之“心之全德”恰如《楞严》之“圆妙明心”。——弄文字学者结果弄到文字障里去了，弄哲学者结果弄到理障里去了也。本求明解，结果不解。故禅宗大师说“知解边事”不成。

知解乃对参悟而言。如云桧树为何门类，枝叶如何，此是知解。要看到桧之心性、灵魂，此是参悟，虽不见其枝叶无妨。禅之喝骂知解，正是找知求解，参悟正是真知真解。禅欲脱开理障，其实正落入理障里了；不赞成知解，正是求知解。

儒家此点与宗教精神同，知是第二步，行第一。《论语·雍也》云：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即此意也。因好之、乐之，故肯去办、肯去行。人总不肯行远道、背重任，不肯去背木梢、抬十字架。“好”“乐”是真干，只“知”不行。人不冤不乐，绝顶聪明人才肯办傻事，因为他看出其中乐来了。

先生讲尽心尽力，学生听聚精会神，这是知解，连参悟都不到，何况“行”？人若说，我不“好”、不“乐”，怎能“行”？其实行了就好、就乐，互为因果。

二、“低处着手”与“犯而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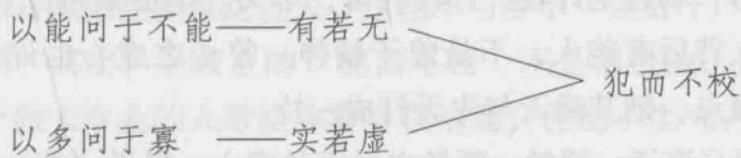
余要使人看出曾子之学问、精神、思想——合为其真面目。曾子之所以为曾子，在此；其所以能表现孔门精神，亦在此。而前所说“任重而道远”太笼统、太高，现在讲低的、细的功夫。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

高处着眼，低处着手。浅近，是着手练习，不是满足于此浅近。理想了现实，现实了理想，浅近是高远之准备，并非停顿于此、满足于此。浅近并非简单。

《论语》文字真好，而最难讲，若西洋《圣经》文字。

曾子“以能问于不能”诸句，图解为：



句形如：_____ —— _____

_____ —— _____

“犯而不校”，一句支住。其好不仅在辞，辞意合一，内外如一。辞是有形之意，意是无形之辞。不是在辞上能记住，是在意上，“犯而不校”就有力。（“犯而不校”，不但儒家，宗教精神亦然。）而其文之前后，又并非只为这样写着美，其意原即有浅、深、轻、重之

分，由浅入深，由轻入重。无论在辞上、在意上，皆合逻辑。

“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不是开玩笑。

开玩笑是不好的，但看用在什么时候。人敢跟死开玩笑——除了穷凶极恶之人不算，那是无意义的——但其大无畏勇气已可佩服。敢跟有势力的人开玩笑，跟暴君开玩笑，你是皇帝，我没看起你。因有意义，玩笑往往成为讽刺。犬儒学派（Cynic）是讽刺。亚历山大（Alexander）谓某哲人将说其坏话，哲人说：“我还不至于无聊到没话可说非说你坏话不可。”中国人开玩笑先相一相对手，口弱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这是阿Q。鲁迅先生说话真了不得，除非他说的话你不信，你若信便无法活。中国的笑话有许多是残忍的，如讥笑近视眼、瘸子。人多爱向有短处人开玩笑，这是不对的、残忍的。又，开玩笑必须心宽才成，跟死开玩笑而非穷凶极恶，跟人开玩笑说话幽默，而绝非无心肝，这便因其心宽大，但宽大绝非粗。（其实，他的乐真是“哭不得所以笑了”。）可是现在人心是小而不细。人在极端痛苦中很难说出趣话，若能而尚非无心肝、穷凶极恶，这便可观了。

曾子虚心到极点，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普通说自己不能，自谦，是为自己站住脚步，是计较利害，连知解都谈不到。是非是知解，利害是计较。计较利害，学文、学道最忌此。怕自己跌倒，怕能人背后有能人，不是曾子精神。曾子之虚心也许是后天的，但用功至极点，则其后天与先天打成一片。

学道最忌诳语、骄傲。骄傲之对面是虚心。慢说“能”“多”，便是“不能”“寡”，也不肯“问”，这样人永远不会长进。会的不想再长进，不会的也不求补充，这样人没出息。曾子虚心是后天功夫与先天个性合于一。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须“下问”。愚人之知，有时虽圣人有所不知也。

“能”“不能”，“多”“寡”，是从表面看，实际也许多还不如寡。

“有若无，实若虚”，岂非虚伪？不是。“有”是表面，内心感觉着是“无”。富人装穷人，对金钱有此功夫。而对学问则不成。人对学问、对道，往往是“无”而为有，“虚”而为丰，这是俗人。曾子

压根儿就没觉得够过，没觉得有过，这是虚心。然但虚心不成，还要猛进。虚心是猛进的一个原因，肚子饿则需要食物之情绪更浓厚。学道、学文必先虚心，然后才能猛进。而猛进有进取之精神，又往往爆发，猛进则爆发而不能收敛，有进取之人则往往于人、于事多有抵牾。所以曾子赶快拿“犯而不校”补上，“犯”正是抵牾。

“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曾子真是虚心，不肯说自己。汉儒、宋儒皆指吾友为颜渊。未必是，也未必不是，总之都是孔门高弟。

“犯而不校。”朱注：“校，计较也。”何晏注引汉人包咸曰：“校，报也，言见侵犯而不校之也。”

犯而不校，以前在中国颇有人实行。凡世人所谓“老好子”“好人”，皆是犯而不校。但他们的犯而不校，的确没什么了不起，虽然他们也要有多年修养；但他们的修养不可佩服，因为他们的“不校”是消极怯懦，不能猛进，不能向前。这或者也不失为明哲保身之道，但这样人能进取向上、向前吗？《论语》则不然。

但犯而不校，在宗教上熟。宗教之经上可曾有一次教人着急、教人怒？如耶稣直到临死未曾怒过，还说叫人怒？佛经戒嗔，不但打你、骂你不能怒，甚至节节肢解，亦不须有丝毫嗔恚之心。《圣经》上说人打你右脸把左脸也送过去，这岂不与乡下“老好子”之“犯而不校”相同？其实，宗教上的“犯而不校”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余以为一个做大事业的人看是非看得很清楚，但绝不生气，无所用其恼。恼只能坏事，凡失败的人都是好发怒的人。三国刘备最能吃苦忍辱，故曰刘备为枭雄。刘备只生过一回气——伐吴，结果一败涂地。诸葛亮说：“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所以刘备一死，诸葛亮赶紧派人向东吴求和。这还是就事业上而言。

在宗教上，在己是求道，对人为度人，都不能发怒。怒，对人、对己两无好处，还不用说怒是最不卫生的一件事。乡下“好人”是明哲保身，是怯懦、偷生苟活，不怒是不敢怒。宗教上所讲不怒，是“大勇”。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提倡大勇主义，佛教提倡大雄，这还不仅是自制、克服自己。因为要做人、做事，我们都不能生

气，不是胆怯、偷生苟活。“愤怒乃是对于别人的愚蠢加到自己身上的惩罚”，这话说得很幽默，可是很有道理，很有意思。（知礼不怪人，怪人不知礼。）这往上说，够不上大雄、大勇主义，但至少比乡下“老好子”好得多。这两句话是智慧，生气没惩罚别人，自己受罪。韩信受胯下之辱是大雄、大勇，但胆怯者不可以此为借口。一种宗教式的不计较与怯懦是两回事，宗教上不怒是道德。

一怒、一校，耗费精神、时间；而一切修养，皆需利用精神、时间。我不相信一个人在怒中能做出什么事来，气来时读书也读不进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是怒，是狠。怒如汽水，冒完沫就完。所以，“犯而不校”看怎么说。匹夫匹妇之勇，是你自己气死，人更痛快。

三、“唯”与“拈花微笑”

曾子可代表儒家。

禅宗有语云：

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真净克文禅师语）

禅宗呵佛骂祖，这才是真正学佛，即使佛见了也要赞成。

然则不要读古人书了？但还要读。受其影响而不可模仿。但究竟影响与模仿相去几何？小儿在三四岁就会模仿父母语言，大了后口音很难改过来；自然后天也可加以修改补充，但无论如何小时候痕迹不能完全去掉。读书读到好的地方，我们就立志要那样做，这也是影响。小儿之影响、模仿只因环境关系，无所为而为。而我们不然，只是环境不成，因为我们有辨别能力，能分辨是非、善恶、美丑、好坏。

但任何一个大师他的门下高足总不成。是屋下架屋、床上安床的缘故吗？一种学派，无论哲学、文学，皆是愈来愈渺小、愈衰弱，以至于灭亡。这一点不能不佩服禅宗，便是他总希望他弟子高于自己。

禅宗讲究超宗越祖，常说：

见与师齐，减师半德。（百丈怀海禅师语）

“减师半德”，成就较师小一半。你便是与我一样，那么有我了还要你干吗？“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僧人自当以佛为标准，而禅宗呵佛骂祖。没有一个老师敢教叛徒，只有禅宗。

狮子身中虫，还吃狮子肉。

这是很正大光明的事，不是阴险，虽然有时这种人是阴险、恶劣。阴险是冒坏，恶劣是恩将仇报。逢蒙学射于羿，那也是“狮子身中虫，还吃狮子肉”，那即是阴险。还有猫教老虎，此故事不见经传，但甚普遍，这不行，这是恶劣、阴险。禅宗大师希望弟子比自己强，是为“道”打算，不是为自己想；只要把道发扬光大，没有我没关系。这一点很像打仗，前边冲锋者死了，后边的是要踏着死尸过去。有人说狮子是要把父母吃了本身才能强，狮子的父母为了强种，宁可让小狮子把自己吃了。大师门下即其高足都不如其自己伟大，只禅宗看出这一点毛病，而看是虽然看到了这一点，做却不易做到这一点。所以，禅宗到现在也是不绝而如缕了。

曾子乃孔门后进弟子，但自颜渊而后，最能得孔子道、了解孔子精神的是曾子。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

你的心便是我的心，你的话便是我要说未说出的话。“唯”字不是敷衍，是有生命的、活的，不仅两心相印，简直是二心为一。

人说此一“唯”字，等于佛家“世尊拈花，迦叶微笑”那么神秘。孔门之有曾参，犹之乎基督之有彼得。有人说若无圣彼得，基督

精神不能发扬光大，基督教不能发展得那么快。但总觉得曾子较孔子气象狭小，就是屋下架屋、床上安床的缘故。

气象要扩大。谁的自私心最深，谁的气象最狭小。人都想升官发财，这是自私，人人皆知；人处处觉得有我在，便也是自私：我要学好，我怕对不起朋友……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

为自己而升官发财，是自私；但自己总想学好，也是自私。所以抒情作品没有大文章，世界大而有人类，人类多而有你，一个大文学家是不说自己的。为了自己要强，也还是自私狭小，参道、学文忌之。

不但大师希望弟子不如他，这派非亡不可；即使是希望弟子纯正不出范围，也不成。愈来愈小，小的结果便是灭亡。天地间无守成之事，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但宗教、文学如此，民族亦然。日本便是善于吸收、消化、利用，所以暴发。人家是暴发，而我们是破落户。暴发户固不好，但破落户也不好。

有的大师老怕弟子胜过自己，其实你不成，显摆什么？成，自然不会显不着。“不用当风立，有麝自然香。”再一方面，弟子好，先生不是更好？只要心好，水涨船高。除非弟子不好，弟子真好，绝不会忘掉你的。

孔子总鼓励他弟子，凡弟子赞美他太多，他总不以为然。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孔子所讲三种美德不缥缈，易知、易行，但并非不高远。说仁、知、勇做不到，但不忧、不惑、不惧总可做到了。孔子此语朱注云：

自责以勉人也。